

元代“四书”类典籍述略

杨 昶

南宋以降，朱熹学说一直被尊为理学的正统。朱熹所撰《四书集注》，吸收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等理学家中与己意相合的论说，综合条贯，加入自己的比较通俗浅近的阐释，使理学借“四书”而得以传播。宋、元、明、清四代，研治《四书集注》的著述层出不穷。但是当今的有关论著，言宋、明、清阐发朱子之学者颇为详尽，而于元代往往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。本文拟论列元代“四书”类典籍，以考察其理学传承状况的一个侧面。

元朝开国之初，在姚枢、赵复等汉人儒士的影响下，在燕京建周子祠（周敦颐祠），又建太极书院，依程朱传注讲授理学，使“北方知有程朱之学”（《元史·赵复传》）；元朝灭南宋后，江南学者多因科举中止而“慨然发愤，致力于圣人之学”（《元史·陈栎传》）；经历几代人的传习，学者撰述的“四书”类论著是相当可观的，仅据倪灿、卢文弨《补辽金元艺文志》著录，元人通治“四书”的著述就达五十二部，七百余卷，这还不包括专治其中一书的论著（如《大学明解》、《中庸章旨》、《论语指要》、《孟子衍义》等）在内。若论其规模，可以说是并不比明朝逊色。按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的明人“四书类”著述，凡五十九部，七百十二卷；虽数额略多于元，却是通治“四书”和专治其中一、二书的著述均收，实际上少于元。又

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尤详明人著作，《四库提要》评曰：“考明一代著作者，终以是书为据。”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明人“四书类”著述，凡九十八部，一千余卷，充其量也就是多于元人著述的一倍（实际不到一倍）。然而明朝（1368—1644）的统治时间约三倍于元朝（1271—1368），著述多出一倍，何足挂齿。

“四书”在元朝是颇受统治阶级重视的，无论南方还是北方，都有不少学者传习研读它。

在把汉文化作为封建文明而逐步加以接受的北方，经学和理学不断得到传播。元初，窦默、姚枢、许衡等就在一起讲习性理之学，成为影响一时的名儒。但在学术上，他们虽对理学有所评议，却谈不上有多少建树。在研治“四书”方面，容城人刘因所撰《四书集义精要》、宁晋人陈天祥所撰《四书辨疑》、河南人何文渊所撰《四书文字引证》、涇阳人冯理所撰《四书中说》、南乐人张淳所撰《四书拾遗》、临汾人薛延年所撰《四书引记》等，代表了元代北方的学术成就。下面以刘氏、陈氏之书为例，略作介绍。

《四书集义精要》三十卷 刘因撰

刘因（1249——1293），容城（今属河北）人，初名駟，字梦骥；后改名因，字梦吉，号静修，《元史》本传载，刘因自幼有天资，“三岁识书，日记千百言，过目即成诵，六岁能诗，七岁能属文，落笔惊人。”后师从国子司业砚弥坚，学习经学；得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、邵雍、朱熹、吕祖谦等人著述，读过评论说：“邵，至大也；周，至精也；程，至正也；朱子、极其大，尽其精，而贯之以正也。”至元中，以学行荐于朝，诏征为承德郎、右赞善大夫。未几，以母疾辞归。后再诏征，固辞。刘因在哲学上继承朱熹客观唯心主义观点，主张维护君臣大义。朱熹撰《四书集注》，凡诸人问答与《集注》有异同的，不及订归于一。朱熹死后，卢孝孙取《朱子语类》、《朱文公文集》所说，

辑为《四书集义》一百卷。由于《集义》过于繁芜，读者深感不便。刘因便对《集义》进行改造，择其指要，删除繁复，题为《四书集义精要》。此书的特点是去取分明，标举要领，使研治朱熹学说者得以不为诸多歧义所惑，《四库提要》称之“简严粹精”、“潜心义理，所得颇深”。此书现存版本已残缺，其中元至顺间刻本为二十二卷，《四库全书》本为二十八卷。

《四书辨疑》十五卷 陈天祥撰

陈天祥（1237—1316），宁晋（今属河北）人，字吉甫。徙家洛阳，居偃师南山，躬耕读书，从游者甚众，号猴山先生。至元中起家从仕郎，以军功累迁监察御史，历治书侍御史、山东西道河北河南廉访使，以集贤大学士致仕。事迹附于《元史·陈祐传》中。宋末，朱熹《四书集注》传至北方，金王若虚素以辨博自居，著《四书辨疑》一卷予以非难。陈天祥偏好王若虚说，于是多加引用，并增益发挥，辨疑朱熹之说，共计《大学》十五条、《中庸》十三条、《论语》一百七十三条、《孟子》一百七十四条，亦题为《四书辨疑》。此书考证虽然间或有疏舛之处（如驳汤盘非沐浴之盘），及改易经文以自圆其说的弊病，但是大多为平心剖析，阐明自己的独到见解，并非苟为门户之争。用作研究《四书》的参考，不失为一家之言。此书现存于《通志堂经解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》诸丛中。

由于女真、蒙古族先后入主中原，大批士族迁徙江南，造就了理学在江南兴盛的氛围。理学大师朱熹就出自徽州，且著述讲学于福建。此外，吕祖谦在浙东聚徒教授，陆九渊学派的后继者在江西和浙东讲学，金履祥隐居金华山中授徒，吴澄在抚州传道……，推动了江南的学术发展，因此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涌现了一批有关“四书”的论著。今录其目于次：

缙云赵顺孙《四书纂疏》二十六卷

金华许谦《读四书丛说》二十卷

休宁陈栌《四书发明》三十八卷、《四书考异》十卷
婺源胡炳文《四书通》二十六卷
平阳史伯璿《四书管窥》五卷
进贤包希鲁《点四书凡例》
黄岩孟梦恂《四书辨疑》
袁州袁俊翁《四书疑节》十二卷
吉水王充耘《四书经疑贯通》八卷
新安汪九成《四书类编》二十四卷
婺源程复心《四书章图櫟括总要发义》二卷、《四书纂释》二十卷
乐平朱公迂《四书通旨》六卷、《四书约说》四卷
休宁倪士毅《四书辑释》三十六卷
宁德陈尚德《四书集解》
新安张存中《四书通证》六卷
南安傅定保《四书讲稿》
平阳陈刚《四书通辨》
临川詹道传《四书纂笺》二十八卷
寿昌邵大椿《四书讲义》
邵武黄清志《四书一贯》十卷
宜黄涂晋生《四书断疑》、《四书经疑主意》
临江萧镒《四书待问》二十二卷
乐平董彝《四书经疑问对》八卷
余姚景星《四书集说启蒙》

现从以上江南诸儒的著述中，择其要者做示例。

《四书通》二十六卷 胡炳文撰

胡炳文（1250—1333），徽州婺源（今属江西）人，字仲虎，号云峰，世称文通先生。事迹附载于《元史·儒学传》之胡一桂传。至元中，任江宁教谕。大德中，历信州路学录，辟为道

一书院山长；调兰溪州学正，不赴。至大中，受聘掌婺源明经书院教事。胡炳文学宗朱熹，于《四书集注》用力尤深。南宋余干饶鲁之学，本出自朱熹而与熹多牴牾，炳文便作《四书通》以匡正其说。此书除了从吴真子《四书集成》、赵顺孙《四书纂疏》所录诸说中摘取十四家之外，又增入四十五家，与朱熹学说对照，凡辞异而理同者，合而一之；辞同而指异者，析而辨之；有所发挥者，则附己说于后，往往能揭示其未尽之蕴。此书用心勤密，不仅考辨颇详，而且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；正如《四库提要》所说：“（朱熹）《集注》所引凡五十四家，今多不甚可考，……是书尚一一载其名字，颇足以资订证。”然而此书的缺点在于“详义理而略名物”，故时人张存中（字德庸，新安人）排纂旧说，删冗从简，撰《四书通证》六卷以补其不足，附于《四书通》之后。存中引经数典，必字句著其所出，《四库提要》评曰：“大概征引详明，于人人习读不察者，一一具标出处，可省检阅之烦，于学者亦不为无补矣。”《四书通》与《通证》相辅相成，多合梓刊行，其版本主要有元天历二年勤有堂刻本和《通志堂经解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》诸丛书本。

《读四书丛说》二十卷 许谦撰

许谦（1270——1337），金华（今属浙江）人。字益之，号白云山人，世称白云先生。事迹俱见《元史·儒学传》。许谦早年从金履祥学，尽传其奥。因宣扬程朱之学甚力，被推崇为朱熹学说之“世嫡”。仁宗时在东阳八华山讲学，有门人千余人。仁宗是理学的提倡者，金华是理学昌盛之地，许谦讲学四十年，名重一时。黄潜为他作墓志铭说：“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复明，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”。又说许谦之学“以五性人伦为本，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”（《黄金华集》卷三十二）。许谦所撰《读四书丛说》，旨在发挥朱熹《四书集注》之义理，特点在于言简义赅；对于其中某些难懂的地方，则采用图表诠释的方式加以直

观的说明，尽量使论说的义理无所凝滞；对于训诂名物亦颇有考证，能补苴《集注》未完备之处。因此，《四库提要》称之“于朱子一家之学，可谓有所发明”。此书在流传过程中缺佚甚多，今见版本已非完帙，其中元刻本、明弘治十二年刻本、明抄本均存八卷，《四库全书》本仅存四卷，远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数。四库馆臣以为大概后世对卷次有所合并，这只是一种揣测之辞。此书还收入《经苑》、《金华丛书》、《四部丛刊续编》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各丛书之中。

《四书管窥》五卷 史伯璿撰

史伯璿，元末平阳（今属浙江）人，字文玘。少嗜学，博通经史，深得朱熹学说宗旨，终身隐居不仕，历三十年撰成《四书管窥》。此书引赵顺孙《四书纂疏》、吴真子《四书集成》、胡炳文《四书通》、许谦《读四书丛说》、陈栎《四书发明》及饶鲁、张栻诸说，取其与朱熹《四书集注》异同者，各加论辨于后；诸说自相矛盾之处，也逐条胪列，并修正厘定。此书大旨与刘因《四书集义精要》略同；在方法上，刘因侧重于删除繁复，而伯璿侧重于剖析别白。因此，《四库提要》称道：“于朱子之学颇有所阐发，考朱子著述最多，辨说亦最伙。”书中虽偶有审核欠精、矛盾抵牾之处，但从整体上看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此书版本颇多，其中元永嘉郡学刻本已残，存《大学》《孟子》各一卷、《论语》二卷，佚《中庸》一卷，凡四卷；元刻明修本已残，仅存《论语》上一卷；清初抄本，不分卷；《四库全书》本，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和《论语》上各为二卷，缺《论语》下二卷，凡八卷；清抄本，八卷；唯《敬乡楼丛书》本全，计有《大学》一卷、《中庸》三卷、《论语》上下和《孟子》各二卷，凡十卷。

《四书通旨》六卷 朱公迁撰

朱公迁，元末乐平（今属江西）人，字克升，世称明所先

生。以特恩授校官主金华郡学，至正初领浙江乡试，后任处州学正。其父朱以实师事吴中行（名中，以字行），学术上承朱熹、黄幹之传。公迂因家学，于《四书》用力尤深。他摘取《四书》之文，条分缕析，以类相从，撰成《四书通旨》。此书分为九十八门，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连缀胪列，并一一辨别异同，标明其立言之宗旨。其长处在于融会贯通、言之成理，故《四库提要》称之：“于天人性命之微、道德学问之要，多能剖其疑似，详其次序，使读者因此证彼，涣然冰释。”但因其门目众多，或涉于冗碎，读者稍嫌此书繁芜；体例又近于类书，无所发明创新。现存版本，主要是《通志堂经解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》诸丛书本。

考察元朝儒士比肩继踵研治“四书”的盛况，不仅可以从中寻绎理学在当时演进的轨迹，而且可以探求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。例如元朝出现了不少像《四书疑节》、《堂书经疑贯通》等这样一类“程试之式”的书籍，它们的问世，说明朱熹《四书集注》在科举考试中已占有重要地位，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展的。又如明朝永乐十三年（1415），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成《四书大全》三十六卷，成祖亲撰序文颁行天下二百余年，尊为“取士之制”。然而，《大全》实际是依据元朝倪士毅《四书辑释》稍加点窜而成。顾炎武对此事曾有考证：“自朱子作《大学中庸章句》、《或问》、《论语孟子集注》之后，黄氏（黄幹）有《论语通释》而采《语录》附于朱子《章句》之下，则始自真氏（真德秀）名曰《集义》，止《大学》一书；祝氏（祝洙）乃仿而足之，为《四书附录》。后有蔡氏（蔡模）《四书集疏》、赵氏（赵顺孙）《四书纂疏》、吴氏（吴真子）《四书集成》，昔之论者病其泛溢。于是陈氏（陈栎，号定宇）作《四书发明》，胡氏（胡炳文）作《四书通》，而定宇之门人倪氏（倪士毅）合二书为一，颇有删正，名曰《四书辑

释》。……永乐中所纂《四书大全》特小有增删，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，《大学中庸或问》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；……仅取已成之书，抄誊一过，上欺朝廷，下诳士子，唐宋之时有是事乎？”

（《日知录》卷十八）胡广等的抄袭剽窃行为固然可鄙，但此事正是元朝儒士学术造诣精深的明证。此外，元朝儒士的学术成就，对后世学术的发展和学派的形成不无影响。江南徽州、浙东、金华等地的学术及其文士集团的形成，都曾得益于元代学者及其著述。以金华为例，朱熹的理学经黄幹传至何基、王柏、金履祥，再传至许谦；许谦聚徒千余人讲学，逐渐培育出一批信奉理学的儒生。明朝初年，金华文士形成以宋谦为首的集团，在政治和学术上均具有颇大的势力。总之，元朝的儒士在宋明理学的迁演过程中，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过去在学术史研究领域里，对元朝的学术成就的考察相对要冷落一些，许多问题尚缺乏恰如其分的评价。因此本文从元朝研治“四书”的典籍入手，探讨理学在当时的承传状况，以期给予其应有的学术地位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华中师范大学文献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